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 (上)

沈弘 编译



TAOU KWANG, THE EMPEROR OF CHINA.

中国的光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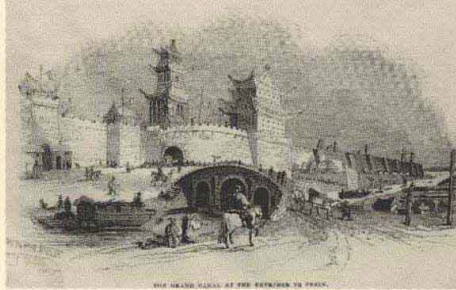
1842

长城与大运河
(The Great Wall and the Grand Canal)

目前我们所收到的来自中国的消息都是令人愉快的。由于即将有新的市场对于英国的制造业开放，所以贸易方面的前景变得更加乐观。而公众的目光也更加稳定和急切地转向了我们在天朝的朋友身上。有关中国的每一个特写报道都能够引起读者新的兴趣。因此我们要在前一篇报道的基础上再补充两篇文章。其中一张表现了世界奇迹之一——长城的一段。另一张是有关大运河的。英国军队最近有几次战役就是在大运河上进行的。

由于本文篇幅有限，不可能包括冗长的统计学细节，否则我们可以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长文。

追溯长城流传至今的几千年历史，这些历史有部分是真实的，还有部分是民间传说——早在基督诞生前几百年之前就已统一了华北的秦始皇是如何建造长城的——明朝的皇帝是如何建造第二道内长城，成功抵御了蒙古征服者的人侵——从长城向东北绵延数百里的长城——那些每隔一段就有一个用于长城的御守的烽火台，过去曾固若金汤，而今却已几近废墟——长城上那些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的堡垒和墩台以及无数长城建造者是如何凭借他们的勤劳和技巧，克服重重困难，把这座巨大无比和举世闻名的长城建在了那些山岭、河流、丘陵和悬崖上。



长城的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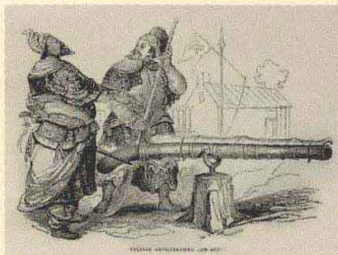


广州

上图所表现的是广州珠江对岸发生大火的情景。例如那儿有一条“木匠街”，一条专卖古董的“古董街”（英国人的称呼），以及一条药铺集中的“药铺街”。每个街区的居民们会组成一个巡逻和守卫体系，以保护公共安全。火灾十分常见，而且经常发生；西方的救火车已被当地人所使用。在当地人中流行的慈善观念使得他们对于火的用法非常不注意。尽管 1822 年的一场大火曾经烧毁了整个城市，“偷窃”是穿越十三行的三条大街之一。它要比任何一个城市的街巷更加狭窄和拥挤。巷子是挤满了简陋的小屋，那儿住着被命运抛弃的中国人。他们把博取钱财的渴望给贫穷而无知的对手。那些可怜的家伙们喝下有毒的饮料之后很快就会变得意志不清，他们经常会受到那些狡猾的诱惑者的袭击，不仅被抢劫一空，还会遭到毒打。最近这个地区已经成为了骚乱的滋生地。

1842

中国
(China)



我们这星期所承担的愉快任务就是不用语言，而且用图画来表现最近《南京条约》中所规定作为战争赔款的中方银两安全到达英国铸币局的情景。我们的版面展现那些马车在英国皇家第六步兵团护送下，载着珍贵的货物，缓缓进入铸币局的情景。这个步兵团（并非像日报上所说是第六步兵团）在这批财富从南安普敦火车站卸下时担任了警戒任务。并且很高兴地起了将它们护送到目的地的职责。它们决定要在哪儿熔化，而且被铸成另外一种形式的钱币。那钱币上面还压印上英国国王的形象，然后在一个跟把它们从大地母亲中提炼出来的人们大相径庭的民族中间流通。

银钱是一个大约三四英寸宽的银块，并被铸成了饼的样子。就像右面插图所示那样。在银块的中间有汉字的印记。我们在图中提供了汉字的样本，以表现汉字的特点。这些象形文字之所以有趣，还因为它们跟最近刚刚缔结的中英《南京条约》上的文字十分相似。

星期二下午大约 3 点钟的时候，由第十步兵团的一支强大军队押送的另外 5 辆马车从位于九榆木的南安普敦火车站到达了铸币局。那些马车上装载着 20 吨来自中国的银钱，价值 75 万大洋。它们是由英国轮船“科伦坡号”从中国运来的。那条轮船是于星期六上午抵达这次港，并且在铸币局供给处理由先行的特别运送到伦敦的。这些银钱被装在 425 个 2 英尺长，1.5 英尺高的木箱中。铸币局的人员为迎接这些银钱早就做好了准备，在接收的常规手续办完之后，它们就被搬进了金库，因为由“澳币”双轮帆船运来并交付的银钱也放在那儿。两者加起来总价值 200 万大洋。由于这些银钱的到来，铸币局里人声鼎沸，大家都非常激动。人们都在期望，在一个星期之内还会有“壳牌号”轮船上价值 100 万大洋的银钱，以及“金安号”轮船价值 300 万大洋的银钱入库。这两艘目前仍停留在英吉利海峡之内。据传这些银钱在被熔化之后，将会被卖给商人，但这并非事实。现在人们相信，在所有的战争赔款都到达之前，有关如何处理这些银钱的命令不会下达。



银钱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上）

沈弘 编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全三册） / 沈弘编译.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 1
ISBN 978-7-80769-193-8

I. ①遗… II. ①沈…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1842～1873
IV. ①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3882 号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 1842～1873（全三册）

沈弘 / 编译

出版人 田海明 周殿富

选题策划 赵省伟 责任编辑 余玲 侯芙瑶

责任审读 金宏达 装帧设计 程慧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制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 69499689

规格 880mm×1230mm 1/16

印张 40.5

字数 90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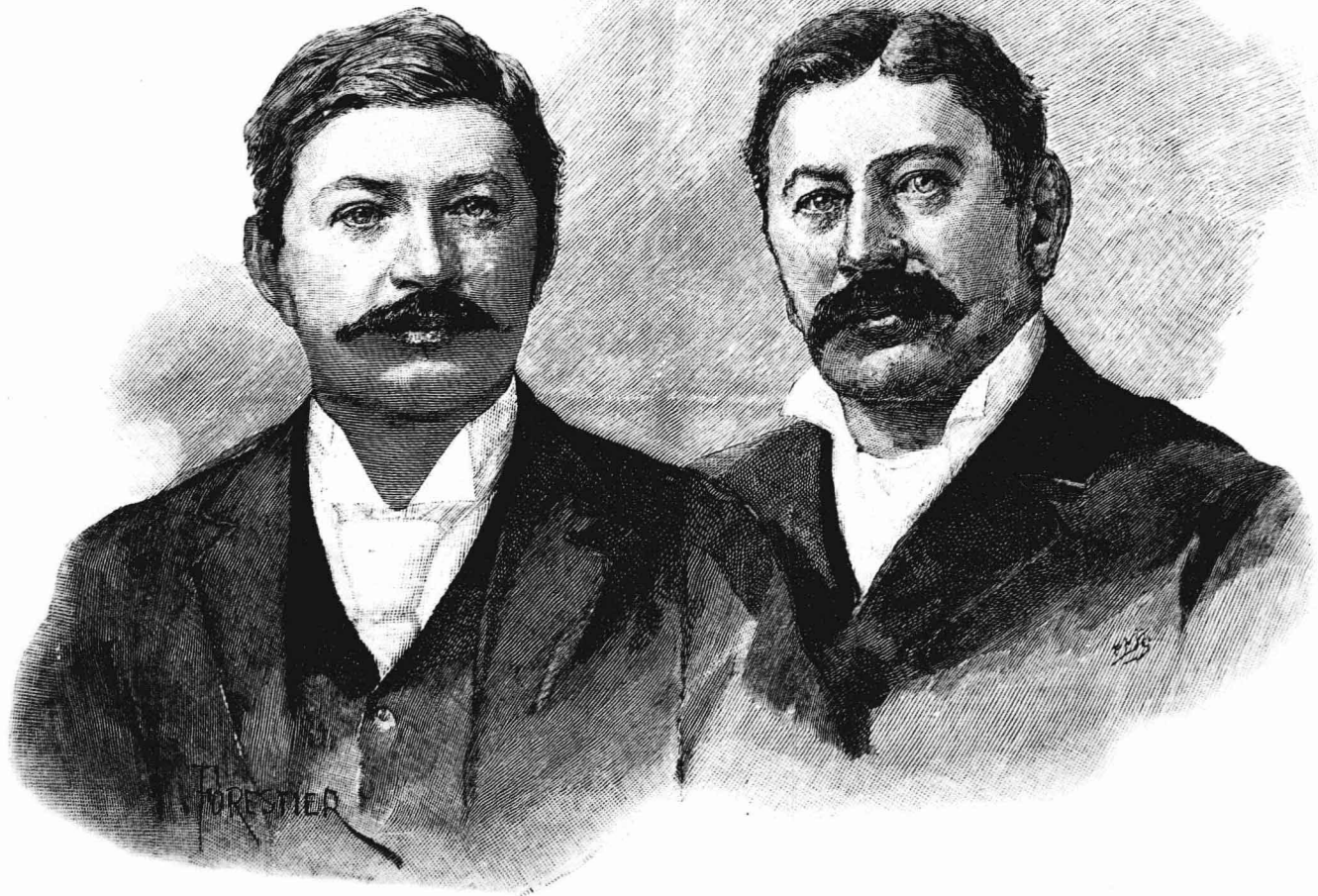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7-80769-193-8

定价 198.00 元（全三册）

※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伦敦新闻画报》创始人赫伯特·英格拉姆



MR. WILLIAM INGR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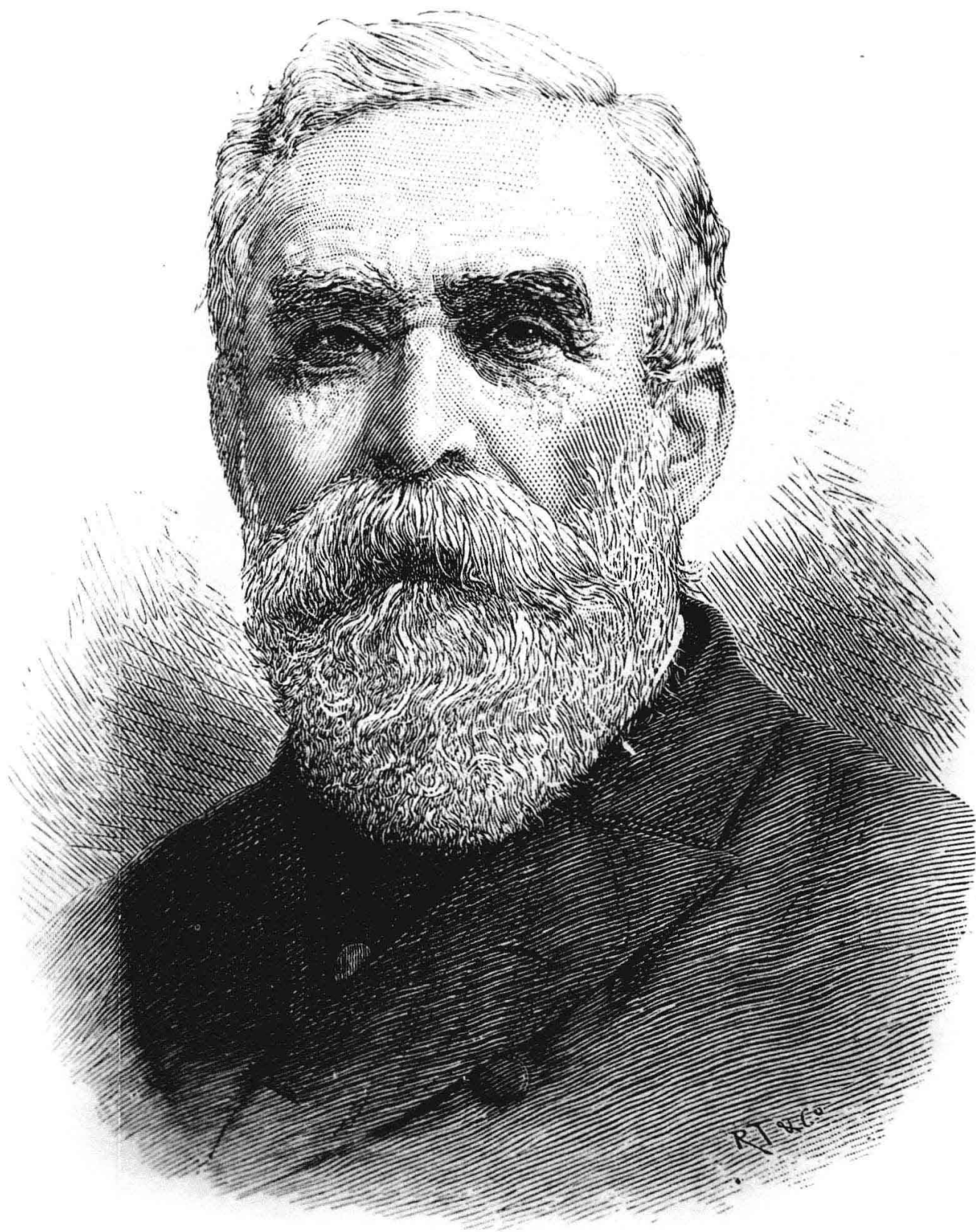
MR. CHARLES INGRAM.

THE MANAGING DIRECTORS OF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英格拉姆的次子威廉和三子查尔斯均曾为《伦敦新闻画报》的高管



英国著名画家约翰·吉尔伯特爵士，他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撑起了《伦敦新闻画报》在创办初期的半边天。在创刊期所包含的 20 幅插图中就有 8 幅是出自吉尔伯特之手



MR. MASON JACKSON.

英国著名画家梅森·杰克逊，担任《伦敦新闻画报》艺术编辑长达 25 年之久。凭借他发明的先进的雕版技术，《伦敦新闻画报》得以在 19 世纪后半期各种新闻画报层出不穷的激烈竞争中始终稳坐钓鱼台，保持其在业界的龙头老大地位



MR. MELTON PRIOR.

《伦敦新闻画报》记者梅尔顿·普莱尔，他在华的时间是1899年，即在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



MR. R. CATON WOODVILLE, R.I.

《伦敦新闻画报》记者 R. 卡顿·伍德维尔，他来中国主要是为了报道甲午战争



MR. JULIUS M. PRICE.

《伦敦新闻画报》记者朱利叶斯·M. 普莱斯，他是被派到中国报道中法战争的



MR. JOHN SCHÖNBERG.

奥地利画家和驰名欧洲大陆的战地记者约翰·肖恩伯格。他是《伦敦新闻画报》为了报道北京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远征北京而于1900年被派往中国的。他到达北京之后，发回了数量惊人的速写图片和文字报道



MR. W. SIMPSON, R.I.

英国著名的写生画家和战地记者威廉·辛普森，曾被派往 40 多个国家去报道那儿的战争、风土人情和其他重大事件。1872 年，他被派往中国报道同治皇帝的娶亲婚礼，该系列报道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使得西方的“中国热”再次急剧升温

出版说明

《伦敦新闻画报》是公认的最早的以图像为主的画报。其以细腻生动的密线木刻版画和石印画，以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再现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画报初始就对中华帝国表示密切关注，派驻大量画家兼记者，仅 1857 至 1901 年就向英国发回了上千张关于中国的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它给当时的西方读者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遥远中国的故事，也为后来的历史爱好者们描绘出近代中国众多大事件的珍贵片断，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史料。这也正是它的弥足珍贵之处和它的出版价值所在。

一、本书为《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第一辑，共三册，收集了 1842 至 1873 年间《伦敦新闻画报》上 189 篇与中国相关的报道，442 张版画。需要指出的是，其中几篇报道如“去中国的路上”、“马尼拉速写”系列等，虽未与中国直接相关，但详实地记录了那时的记者们是如何前往中国采访的全过程，所以译者和编辑一致认为应将它们也收录其中。

二、编排上每年为独立一章，小节按照英文登载时间先后排列。小节标题使用中英文两种文字，英文依照原刊录出。此外，为尽可能呈现原文风貌，本书小节标题以及正文中出现的页码均依据原文未做变动。

三、为了保证图像的精美，书中做了简单的上色处理。图注均依据原刊的英文图注编译。

四、由于原作者与我们所处的立场不同，思维方式和观察角度不同，因此本书对于某些具体历史细节的描述和解释，与我们通常的说法或有出入，有的甚至把列强侵略行径、强盗罪恶说成是造福救助，自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陈辞滥调。但为忠于原文，对此译者和编辑均未作删改，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认同这些说法，也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时自会鉴别。

五、可以肯定在同时期载有中国图文的西方书刊中，没有一种可以同《伦敦新闻画报》等量齐观。如今我们将这一宗他者所描绘的中国图文呈现在读者面前，希望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关注。限于条件和编辑水平，难免有疏漏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一并感谢沈弘老师为我们从大洋彼岸搜集回来这些珍贵的史料，并亲自笔译全部文字，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相信此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对中国史感兴趣的爱好者的欢迎。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年 1 月

在西方发现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马勇

中国文明原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会排外。因为中国文明如果具有排外的因子，那么所谓的中国文明至今应该还在黄河中下游某一个地方徘徊。从历史主义观点看，中国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包容性，一切异质文明因子都会被中国文明接纳、重组与吸收，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渐渐成为不可须臾再离开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固有所本性。

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问题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文明曾经在历史上包容、吸纳了本土的异质文明因子，比如周边族群的“胡文明因素”，也曾接纳域外文明印度佛教。更厉害的是，经过八百年磨合，到了唐末宋初，原本纯粹的印度佛教文明，竟然完成了“中国化”改造，竟然衍生出一个“中国佛教”，竟然有一个与印度佛教关联并不太大的禅宗。凡此，都是中国文明的奇迹，也是中国文明不会排外的证明。

中国文明排外还是后来的事情，与中国文明、

印度文明完全不同的西方文明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明也没有排斥西方文明。假如我们回望过去两千年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可以看到中西之间的交往，可能远大于我们后来的想象。秦汉帝国已经与西方往来，后来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到了纯粹西方的边缘地带。至于元朝，尽管与唐朝一样，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原王朝，但在中国的历史序列中，我们并不会排斥元朝，甚至以为元朝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元朝的征战固然给东西方带来一些灾难，但中西文明在那个时代确实出现过一次为时不短的正面接触。

那么，中国文明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我们面对西方的时候有一种被欺凌受伤害的感觉呢？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课题。大致上说，应该归咎于满族人的统治。满族人入主中原的时候，毕竟面临着汉化、西化双重压力，满汉之间的心里纠结几乎始终困扰着满汉这两个大的族群。清朝在

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内部原因而没有延续明朝中晚期与西方文明坦然交往的历史。

而清朝的早中期，也就是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正是人类历史发生突飞猛进变化的时期，中国在满族人的统治下闭关锁国断断续续不过一百多年，当中国再度面对西方的时候，此时的西方已经不是原来的西方了，中国与西方从原来的异质文明变成了两个时代的文明。中国文明还是一个纯正的农业文明形态，而西方文明已经在这两个世纪变成了工业的、商业的，也即近代的文明。

两个时代的异质文明并不构成交往的滞碍，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准确地说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时候——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中国肯定会经过一场阵痛，但中国必然会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一定能够像几百年前接纳印度佛教文明一样，重建一个新的文明形态。

然而，历史没有办法复盘。聪明绝顶的乾隆大帝就是不愿接纳西方，不同意与西方——其实那时也就是英国——构建一个与“朝贡贸易体制”不一样的近代国家关系，不同意让“红毛番”进驻北京，不愿意与西洋人同城。

乾隆大帝的失误不是使中国继续自外于世界多少年，而是使中国问题越到后来越复杂。中西之间不能构建和平的近代国家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重回铜墙铁壁的桃花源，中国事实上始终就没有完全中止与西方的贸易交往，一口通商始终存在，非法的贸易更是朝野通知，甚至自得其乐，自以为聪明。

非法贸易让中国错过了和平转型的机会，中国

没有办法接续明代中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走上一个新的时代，更没有办法完成产业转型、市场开发，没有办法打破“四民社会”，重组社会结构。

中国在被动中日趋被动，特别是贸易失衡之后的鸦片贸易，不仅将人工营造的“康乾盛世”打回原形，而且使中国在那个时候渐渐有了一种被欺凌的感受。如果我们仔细体会林则徐1839年的言论，就应该承认林则徐的广东之行并不是鲁莽，也不是不懂贸易规则，不懂世界，而是一种忍无可忍的抗争。

林则徐的广东之行如果以胜利结束，相信中国或许能够从头开始，接纳西方，重构中西关系。或者，林则徐如果能像蒋廷黻的另外一种设想，彻底被打败，一败涂地，中国在那个时候或许就会猛醒，就会变革，就像二十年之后中国所走的路。无奈，中国在经历了两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签署了一个《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中国又回到宁静的农业文明形态中去了。

到了1860年，中国再一次被英法打败，中国与英法美俄等大国相继签署了《北京条约》，中国终于醒悟，终于迈出了走上世界的步伐。

中国人的活力，中国文明的接纳力量，都是不可思议的强大，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从1911年回望1860年，中国的变化就是不可思议，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政治架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但中国的天，中国的地，都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中国从传统走到了现代，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已经接纳了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一个全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时的中国人终于实现了世界各族

以平等身份待我的梦想。

直至今时，中国人的历史叙事还没有那么多的抱怨，没有怨妇式的唠叨，即便再过十几年，到了五四前后，我们去读陈独秀、胡适、梁漱溟左中右各派学者的论述，他们在回望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时并没有抱怨西方，并不认为外部因素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然而不幸的是，20世纪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思潮在那个时代深刻影响了中国，此后的中国渐渐地改变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叙述。被侵略、被欺凌的话语渐渐成为近代中国叙事的主流，中国人的心理渐渐被蒙上了一道从来没有过的阴影。

中国文明是一个包容的体系，一百多年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文明的大度。近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不应该让历史虚无主义继续笼罩，我们应该更多地参照近代西方的历史叙事，重构或者说修正、补充我们过往的历史叙事。

正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我饶有兴趣地翻阅了这部《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这部取材于《伦敦新闻画报》的大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察视角，提供了中国留存文献中漏记误记的内容，使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还可以这样去论述去讨论。

二十多年前，近代中国史学界受益于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冲击—反应”、“传统—现代”模式，开始从中国自身寻找历史发展的因素。今天，我们应该注意“在西方发现历史”，应该从西方的记录中寻找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另一种记录。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竭诚向各位推荐沈弘先生用数年时间精心编译的这部巨著。

马勇，2013年11月16日星期六

图像的力量

中央美术学院 陈琦

在大众信息传播领域，相对于抽象的文字，图像往往更具直观性而更易被大多数人接受。尤其是那些远古的神话故事或是流传广泛的宗教神迹，抑或遥远边地的异域风光、风土人情、相貌特征，图画不仅能提供鲜活的视觉形象，还能令读者在画面背后产生无尽的想象。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祇树给孤独园》是唐咸通九年（868年）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扉页插图，是目前有年代可考的最早文字出版物插图。它的出现不仅开启了插图文本的新时代，并由此将插图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绘画艺术形式——版画。

版画是通过印版媒介将图像转印于纸上的绘画作品，具有间接性与复数性。然而最初的版画却不是出于艺术审美的创造目的，而源于人们对图像复数的需求。宗教是一种最广泛的精神性活动，需要大量的宣传物以传播教义。是以无论中外最早的版画几乎多为宗教插画或神迹故事绘图。如发现于敦煌的公元7世纪用二方或四方连续方式捺印的《千佛名经》，以及在法国普洛塔家族中发现的公元1380

年描绘基督受刑的“普洛塔木版”。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印刷科技的发展，出版业逐渐由贵族和宗教掌控中走向平民化的商业市场。公元1450年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铅合金的活字排版印刷技术，使西方印刷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并对此后西方图书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世纪时，欧洲的印刷作坊已遍及各地，并且形成许多印刷中心，如尼德兰的乌德勒支、德国的纽伦堡、奥格斯堡、科隆，还有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城市。

书籍出版业繁荣的同时也带动书籍插图业的兴旺。德国巴伐利亚州班贝格地区主教秘书阿伯雷奇·费斯特是西方最早为书籍配上印刷插图的人。他在1461年出版了名为《宝石》的书，书中收录了一些鸟类和兽类的故事并配有精美插图。显然，版画插图使书籍更加丰富和具有直截了当的说服力与吸引力。这就使得版画插图逐渐成为出版物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同时也成为出版业市场竞争中的核心力之一。如我国明代中期，全国政治安定，经济平稳，文化时尚观念发生转变，一批新兴读者群